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十二卷

人 民 出 版 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二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29  $\frac{3}{4}$  · 插页 7 · 字数 705,000

1962年8月第1版

1965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531 定价（四）2.30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 第十二卷說明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收集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6 年 4 月至 1859 年 1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本卷所收的絕大部分文章和通訊曾发表在当时进步的美国报纸“紐約每日論壇报”上。少数文章曾刊载于英国宪章派的报纸“人民报”和倫敦的“自由新聞”，并且其中有几篇曾同时发表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

編入本卷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写作时期，标志着馬克思所說的“难忘的十年时代”开始临近結束，这个“十年时代”是在 1848—1849 年革命失敗后到来的，它的特征是一方面世界資本主义經濟蓬勃高漲，另一方面黑暗的政治反动橫行欧洲。这个时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資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 1857—1858 年世界經濟危机，它席卷了所有欧洲大国和美国。

馬克思和恩格斯始終认为五十年代的欧洲反动时期只是一个暫时的阶段，只是历史賜給资产階級旧社会的一个“喘息时机”。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反革命的胜利不是长久的；他們甚至在最黑暗的反动时期也不曾放棄欧洲很快将掀起新的革命浪潮的信念。他們曾指望迫近的經濟危机将成为全欧革命的先声，将加强民族解放斗争并加快欧洲几个最发达国家的无产階級革命的到来。早在五十年代初，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在总结 1848—1849 年革命被镇压以后的革命运动时，便得出了“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

有可能”的結論（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514頁）。對1848—1849年革命以後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全面分析，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堅定了他們的這一見解：經濟危機是引起革命危機的最強大因素之一。

到五十年代後半期，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形成過程基本上已經完成。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已經大致制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初步原理已經確定。從社會生產的發展在社會歷史上起決定性作用這一唯物主義歷史觀出發，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對於無產階級特別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揭示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規律和將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地改造為社會主義社會的規律的嚴謹的經濟理論。在兩位無產階級領袖看來，在經濟危機之後，歐洲必然要爆發新的革命，因此，經濟危機的即將到來便促使馬克思從1856年10月起更加緊從事他的經濟研究工作。

在1857年8月危機最嚴重的时候，馬克思利用他在以往年代所收集的材料，集中精力着手寫作他的經濟巨著。馬克思進一步充實這些材料，並部分地進行加工，打算把他這部經濟著作分六冊出版。這部著作開頭部分的初步方案保留下來了，這就是篇幅龐大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曾於1939年以《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 1857—1858》的標題用原文出版。這些手稿反映出馬克思經濟學說形成中的重要階段，他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和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性進行研究的重要階段。手稿中已經制定出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它們後來由馬克思在所有三卷“資本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以及

“剩餘價值學說史”中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在 1857—1858 年的手稿中，馬克思闡述了他那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石的剩餘價值理論的最基本的要點。

本卷刊載了馬克思在 1857 年 8—9 月為上面提到的那部他未能按最初計劃完成的經濟著作所寫的“導言”草稿。雖然這篇“導言”不是最後完成的作品，但是它富有深刻的思想，並且具有很大的獨立的科學價值。馬克思在這裡揭示了政治經濟學對象的本質，分析了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之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問題，同時指出了生產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決定性作用。“導言”中特別闡述了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方法。其中還包含有一些將馬克思主義關於一系列社會現象的學說加以發展和具體化的卓越見解，例如，關於作為社會意識的形式之一的藝術在一定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發展規律的重要原理。

從 1858 年 8 月起，馬克思利用 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的有關章節，加緊寫作他的經濟著作的第一冊第一分冊。他在 1859 年 1 月結束了這一分冊的付排準備工作，並且用“政治經濟學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的書名在柏林出版。但是馬克思未能出版以下各分冊。後來他放棄了最初的經濟研究計劃而制定了一個新的計劃，“資本論”就是這個新計劃的體現。

馬克思在為發展他的經濟學說而從事緊張理論工作的同時，在這幾年還寫了大量的政論文章，對國際生活和歐洲各國國內政治的一切重大問題做出反應。革命的政論作品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整個反動時期進行政治活動的主要形式之一，在這幾年，兩位無產階級領袖正是利用它作為主要手段來對無產階級施以革命影響，培養他們的階級覺悟，闡明他們作為資本主義掘墓人的具有

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他們在未来对旧社会进行革命改造中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无产阶级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理。

本卷开头刊载了馬克思于1856年4月14日在紀念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創刊四周年的宴会上发表的演說记录。在这篇篇幅不大但內容非常深刻的演說中，馬克思用生动的、为英国广大工人群众所能理解的語言扼要地闡述了他的革命学說的本质。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只有用一种办法才能够解决，这就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馬克思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中能够改造旧世界的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这个确定不移的事实。他說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們，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見本卷第4頁）

編入本卷的馬克思的很多文章和通訊都是专门分析1857—1858年世界經濟危机的发展的。馬克思从危机在信貸和货币流通领域中只有最初的、甚至还不明显的征候时起就开始研究它，他仔細地着重研究了英国、法国和德国各个經濟部門的危机的表現形式。馬克思对这几个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发展情况所以特別感到兴趣，是由于馬克思和恩格斯預期正是在这些国家会爆发无产阶级革命。

馬克思关于危机的文章包含有一系列重要的理論概括和結論，它們揭示了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的規律性，特别是资本主义在五十年代这个时期发展的規律性。馬克思指出，大規模的投机企业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在克里木战争結束以后，投机活动得到特別蓬勃的发展，它相继侵入許多资本主义国家經濟生活的各个主要部門：借貸資本、商业、工业和



农业，很快便帶有普遍的性质。投机活动首先在法国开始，很快便蔓延到德国。所有經濟比較发达的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卷入了这个漩渦。早在1856年秋天，在經濟危机开始以前几个月，馬克思便正确地預見到，这种普遍的投机倒把現象將必然以普遍危机告終（見“欧洲的經濟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等文章）。在一系列探討信貸貨幣关系的文章中，馬克思对世界金融市場的状况，特別是五十年代非常发达的期票信貸領域，作了卓越的分析。

全面了解世界工业和貿易的状况，深入研究世界出口和进口的比值，仔細考察作为世界金融市場中心的英格兰銀行的貼現率的变动，經常观察成为欧洲投机狂热中心的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有价证券行情的漲落，探究黄金比白銀貶值以及白銀在五十年代从欧洲流往亚洲的原因，——这一切使馬克思能够早在危机前的擴張时期就完全准确地不仅預見到普遍危机的必然性，而且还預見到它的发展的特殊性。在“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銀行法”、“英国貿易的震蕩”、“英国的貿易危机”、“欧洲的危机”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馬克思預先就确定了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性质，他指出，就其强烈程度和涉及的范围來說，这一次危机必然要超过以往的一切危机，并且最終要酿成世界的工业危机。

馬克思在一系列文章中分析了1857—1858年的經濟危机在个别国家中发展的特点。他在“英国的貿易”和其他几篇文章中，強調指出了受危机侵襲最大的是英国，因为它当时是世界金融市場的中心。英国危机的特点就在于它震撼了国家繁荣的根基即工业，而帶有工业危机的性质。在上述这些文章以及“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銀行法”、“英国的貿易危机和貨幣流通”、“英国的貿易和金

融”等文章中，对于英国自由貿易派以自由貿易原則作为防治危机的万应灵药的观点都有尖銳的批評。馬克思闡明了资产階級經濟学家妄想找到防治危机的丹方只是白費气力，駁斥了他們关于1857年危机以及一般危机的起因的簡單化的庸俗說法，同时做出了关于危机理論的重要結論。馬克思指出，任何危机的真正原因都不是像自由貿易派所說的那樣在于过度的投机和信貸的濫用，而是在于資本主义本性所固有的社会經濟条件。他指出，危机“是現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見本卷第607頁）

在馬克思有关經濟和金融的文章中，关于当时著名的法国股份銀行 *Crédit Mobilier* 的几篇文章具有重要意义，該銀行的投机的交易所伎倆曾大大加剧了1857年的經濟危机。

馬克思分析 *Crédit Mobilier* 的活动，找出这个股份公司不同于其他股份公司的特点，同时在“法国的 *Crédit Mobilier*（第三篇論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在理論上很重要的关于股份公司的形式在資本主义时期的意义和作用的原理。股份公司在五十年代还只是处于自己发展的最初阶段，并且“还远沒有为自己創造出适当的結構”，但是它們在当时就已經是发展資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馬克思写道，它們对資本主义各国国民經濟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計再高也不为过的”。（見“英国的貿易和金融”）馬克思把股份資本形式的发展同資本主义經濟往后的进化联系起来。他写道：“当然，不能否认，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現代各国經濟生活中的新时代。”（見本卷第37頁）一方面，以股份公司的形式把个体資本联合起来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因而

能够创办单个資本家力所不及的那种規模的工业企业。另一方面，股份公司在迫使小資產階級破产的同时，加速生产的积聚和資本的集中，造成工业資本家寡头集团日益加强的統治。同时，雇佣工人的人数也在增长，对于剝削他們的資本來說，他們將“随着代表这种資本的人数的减少”而成为愈益可怕的革命力量。在这些論断中，馬克思实际上已經天才地預見到了資本主义壟断阶段的若干特征。

馬克思和恩格斯探討殖民主义問題的文章在本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在这一时期仍繼續对資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和到五十年代中期已具有广泛規模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給予最大的注意。

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和印度的事件的文章中，馬克思發揮了他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提出的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欧洲革命前景之間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賴的关系的思想。

馬克思曾強調指出，成为欧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的白銀在五十年代从欧洲流向亚洲的現象，跟太平軍起义有部分的联系，并且写道：“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見本卷第76頁）印度1857—1859年的民族解放起义牵制了英国的大量武装力量。馬克思曾将这一起义与別的决定性因素相提并論，认为这些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促使英国被卷入即将到来的革命。（見“欧洲状况。——法国財政状况”、“英国的政党。——欧洲状况”）

馬克思关于資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和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两种因素互相影响的思想，奠定了馬克思主义关于民

族殖民地問題的學說的進一步發展的基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中國、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文章中所包含的關於無產階級在民族殖民地問題方面的政策的基本思想，後來由創造性地深入地研究了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弗·伊·列寧全面地發展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闡述各被壓迫民族反對英國統治的鬥爭時，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精神教育歐洲的工人階級，主張堅決支持波斯、中國、印度、愛爾蘭的民族解放運動。他們關於1856—1857年的英國—波斯戰爭、1839—1842年和1856—1858年的兩次對華鴉片戰爭、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解放起義的文章，是對英國殖民主義者的鮮明的揭露性文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些文章中憤怒地抨擊英國在亞洲的殖民擴張，揭露英國在印度和中國推行殖民政策的方法。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英國這個當時最大的資本主義強盜早在十九世紀中葉借以取得殖民壟斷地位的方法和手段時，指出英國資本主義用公開的搶劫和暴力或者用收買和欺騙來實現它在亞洲大陸各國的侵略。

在“英國—波斯戰爭”、“英中衝突”、“對波斯的戰爭”、“英國—波斯戰爭的前景”這些文章中，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強調指出了英國在亞洲的外交活動的侵略性質，這種外交活動是英國殖民擴張的主要手段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英國殖民主義者所慣用的和典型的外交方法，是給地方當局加上莫須有的罪名，說它違背了條約的義務或者沒有遵守某些外交禮節上的無關緊要的規定。這些都被當做武裝侵略、強占領土和締結新的不平等條約以使這種占領及其他對英國侵略者有利的條件合法化的借口。英國資本家

为了在波斯和阿富汗取得独占势力，不仅自私地利用了居住在这两个国家里的不同民族之間的部落的、民族的和宗教的糾紛，而且还人为地煽起了这两个国家同相邻各国之間的仇恨。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卷所收的一系列文章（“鴉片貿易史”等）中写到对中国的鴉片貿易，这种貿易是英国侵略者踐踏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利益的有力证明。英国侵略者在基督教伪善的文化傳播者的假面具下面，使他們所壟断的鴉片走私貿易成了他們发财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英国政府口是心非地宣布自己反对鴉片貿易，实际上却在印度推行了并且为自己取得了鴉片生产的壟断权，使得向走私商人出售鴉片合法化，而且早在十九世紀初便由这种貿易取得了大量收入。馬克思得出結論說，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財政，不只是依賴对中国的鴉片貿易，而且正是依賴这种貿易的走私性质。

馬克思表明，鴉片貿易如何掏空了中国的国庫，破坏了国家的經濟并且使人民遭到体力衰竭和道德堕落的威胁。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对付中国当局对这种貿易的反抗而挑起了两次所謂鴉片战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这两次战争的历史和說明它們的海盜式掠夺性质的时候，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对他們所占領的中国領土上的和平居民橫施的暴行。恩格斯在分析第一次对华鴉片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时，指出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这次战争中自始至终是极端殘忍的。（見“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馬克思写道：“当时英国士兵只是为了取乐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們的狂暴既不是由于受宗教狂热的驅使，也不是由对傲慢的征服者的仇恨激起的，更不是由英勇的敌方的頑强抵抗引起的。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燒整个整个的村庄，这些并非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軍官亲笔記載

下来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为。”（見本卷第 309 頁）在就第二次鴉片戰爭所寫的“英中衝突”、“議會關於對華軍事行動的辯論”、“英中條約”等文章中，馬克思得出結論說：以殘酷轟擊廣州和平居民開始的第二次戰爭，也與第一次戰爭一樣，具有強盜的性質。

馬克思和恩格斯怀着深切的同情談到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的頑強而積極的鬥爭。他們駁斥了那些對中國人採取的特殊鬥爭方式極盡辱罵之能事的殖民主義資產階級辯護人，認為中國人民面對着武裝到牙齒的殖民主義者，條件相差懸殊，這些方式是必須採取的。恩格斯寫道：“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國人反對一切外國人的普遍起義，并使這一起義帶有絕滅戰的性質。”（見本卷第 232 頁）恩格斯認為中國人民群眾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對英國侵略者的反抗是真正的人民戰爭，即“為了保存中華民族”而進行的戰爭。而對於起義民族在人民戰爭中所採取的手段，——恩格斯解釋道，——不應當根據“公認的正規作戰方法或者任何別的抽象標準來衡量，而應當根據這個起義民族所已達到的文明程度來衡量”。（見本卷第 232 頁）

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人曾經以先知之明預言過舊中國的死亡和新中国的誕生。他們深信這個偉大而古老的國家將會得到解放，並且認為這一解放必然將對東方各國的進步發展具有最偉大的歷史意義。恩格斯寫道：“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垂死的掙扎，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見本卷第 234 頁）

本卷中刊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印度 1857—1859 年的偉大民族解放起義所寫的大量文章。這些文章揭示了起義產生和失敗

的原因，評述了起义的性质，并作出了对起义的历史评价，闡述了战事的进程。

馬克思主义的創始人把印度的起义看做是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整个解放斗争的一部分，論证了印度起义和英国在亚洲的几次殖民战争之間的相互依賴关系。在“波斯和中国”、“与波斯签订的条約”等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結論：英国一波斯战争和中国的第二次鴉片战争，由于基本上是以英印军队进行的，便給印度人民增加了更加不堪忍受的負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印度起义的爆发。而这一起义又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匆忙同波斯締結和約，并且把在中国的軍事行动中断了好几年。

英国統治階級力图掩飾印度起义的真正性质和規模，想把它說成仅仅是西帕依（孟加拉英印军队中的土著部队）的軍事叛乱。英印当局費尽心机掩盖印度广大阶层居民参加起义的事实，企图证明起义是伊斯兰教徒发动起来的，似乎并没有得到印度教徒的支持。

馬克思和恩格斯駁斥了这些虛伪的論調，他們一开始就把印度起义看做全民族的运动，看做印度人民反对英国統治的革命。（見“印度军队的起义”、“来自印度的消息”、“印度起义”、“勒克璠的解救”）他們认为下面这个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即在起义期間，不仅是不同宗教的代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也不仅是不同种姓的代表——婆罗門、拉吉普特人，往往也包括錫克人，——而且还有印度社会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都团結在一个反对英国統治的共同联盟中。馬克思写道，“西帕依团杀死了他們的欧洲軍官，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忘却了他們相互間的仇隙，而联合起来反对他們共同的統治者；‘騷动由印度教徒开始，而实际

上其結果是在德里拥立一位伊斯兰教的皇帝’；起义已經不僅限于少数地区；最后，英印军队中的起义与亚洲各大国对英国統治的普遍不滿同时发生，因为在孟加拉軍內的起义无疑与波斯战争和中国战争有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見本卷第 252 頁）

馬克思在“印度起义”这篇文章中无可辯駁地证明了，印度人民是同情并且支援起义的，印度各阶层人民都广泛参加了起义。馬克思說，单是起义得到极大規模的发展，而英国人在給自己军队保证运输和彈药方面到处遇到阻碍这一点，就已证明了印度农民对英国侵略者的敌对态度。

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推动印度起义的直接原因，与英国在印度的統治条件到十九世紀下半叶初期所起的变化，特别是土著军队职能的改变，有紧密的联系。馬克思指出，英国能够征服印度并且在一百五十年来占有它而没有发生任何巨大的动蕩，主要是靠一个基本原则，即“分而治之”。在不同的种族、部落、宗教、种姓和个别自主的公国之間煽起仇恨，是英国在印度巩固它的統治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从十九世紀中叶起，这一統治的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工具的东印度公司，这时完成了領土占領而成为这个国家的唯一的征服者。为了使印度人民馴服順从，它不得不依賴它所建立的土著军队，要这种军队担当的主要已不是軍事职能，而是镇压被奴役人民的警察职能。这样，印度人民的馴服就由土著军队的忠誠来决定。但是，印度的英国当局建立这样一支军队，“同时也就組織起了印度人民过去从未有过的第一支核心的反抗力量”。（見本卷第 251 頁）馬克思正是以此來說明，为什么发动起义的并不是飢餓的、被搶得精光的印度农



民，而是处于特权地位的、收入很好的西帕依。

但是，起义的动力决不限于土著军队的士兵。馬克思指出，西帕依在起义中只起着工具的作用（見“印度問題”）。起义具有无比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都植根于印度人民对于长期的殖民压迫、对于英国侵略者在印度的强盜行为以及实行殖民剝削的殘酷方法普遍感到不滿。馬克思在“印度刑罰的調查”、“印度的捐稅”这两篇文章中強調指出，极其繁重的捐稅、敲詐勒索以及在征收國稅时到处采用的暴力行为和酷刑，在印度农民的生活中是常見的現象。刑罰成了英国在印度的財政政策的官方认可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时，所征收的捐稅沒有拿出一絲一毫来以公益設施的形式还用于人民，“这种公益設施对亚洲国家比对任何地方都更加必不可少”（見本卷第 552 頁）。

馬克思指出，靠兼并仍然独立的国土和沒收土著公国的土地来强力扩大英国領地的政策，也是起义的直接原因之一（見“奧德的兼并”、“坎宁的公告和印度的土地占有問題”）。这种政策引起了印度大部分有产階級，特别是封建地主对英国統治的不滿。在起义时期，在印度資產階級中間也可以看到对英国統治的反对情緒，关于这一点的证明是，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为印度战争的需要而发行公債，沒有获得成功。

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印度人民的解放斗争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們相信，只要所有一切能够与殖民主义者作斗争的印度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印度南部和中部的各阶层人民行动起来，起义是能取得胜利的。但是，由于一系列历史原因，如印度的封建割据、印度居民的民族复杂性、印度人民在宗教上和种姓上的隔离以及絕大部分領導起义的地方封建主的背叛，並沒有出現这种共同行动。